



民国时期新旧文学 关系散论

尹奇岭◎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新旧文学

关系散论

尹奇岭◎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新旧文学关系散论/尹奇岭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161-9631-1

I. ①民… II. ①尹…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571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兴芳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19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资助项目
民国以来旧体诗在新文学中的地位研究——以安徽为中心的考察
(批准号: AHSK09—10D128)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日记书信中现代文人私人叙事研究（1917—1949）”
（批准号：15BZW163）阶段性成果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晚清五四以来的启蒙思潮	(14)
第二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破旧立新	(35)
第三章 启蒙与传统	(57)
第四章 对新文化的检讨:以“科学”话语为例	(69)
第五章 晚清民国以来传统文化的破坏	(84)
第六章 民国时期新旧文学经济状况的考察	(91)
第七章 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刊印传播	(108)
第八章 民国时期旧体文学的创作及理论成就	(125)
第九章 文言与白话的同根共生	(151)
第十章 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流风遗韵	(162)
第十一章 民国时期安徽概况与旧体诗词活动	(176)
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接地性	(195)
附录一 晚清民国渐进思潮初探	(207)
附录二 40 年代汪伪统治时期古体诗词的复兴	(220)
参考文献	(234)

绪 论

纵观一百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历程，因应时势变迁、国力强弱，新旧之辨、新旧之争既有思想文化论争的学术意图，更是现实政治参与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就思想文化论争层面而言，注重学理层面阐发，探幽发微，以真知为皈依，是那些坚守学术伦理的知识精英内在追求，他们心怀与“价值无涉”的伦理标准，并不在意外在的价值判断。就意识形态斗争层面而言，着眼于现实实践，以排除异己力量为己任，以战胜为皈依，以鲜明的价值观为判断标准，这个标准往往以“进步”和“落后”为标签，激起价值观的冲突和对抗，贴合时代潮流的被认定为“进步”，和时代潮流有抵触的往往被贴上“顽固”或“倒退”的标签。顺应时代潮流，迎合公众心理，也成为意识形态斗争中常见策略。^①

一 时代转型中的传统

回顾一百多年来的思想文化变迁史，我们发现过于强大的外在压力，使内生的民族文化心理处于焦灼中，理性与非理性缠夹不清，知识精英的个人话语往往被党派意识形态所煽动的大众意志吞没。就传统与现代关系而言，首先，何谓传统，何谓现代，从学理层面说清楚就不容易。其次，现实的社会进程不可能等待知识精英们将传统和现代厘清之

^① 尹奇岭：《学术伦理和社会伦理的抵牾——试析陈寅恪“对对子”事件》，《学术探索》2009年第2期。

2 民国时期新旧文学关系散论

后才行动。因此，种种思想文化问题时常会转化为信念问题、价值观问题。从现实话语层面上观察，文言和白话问题，就是一个对应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一般而言，文言对应于传统，白话对应于现代。新锐的文学革命者认定白话为活的，文言为死的，其实学理的根据是不足的，但现实的选择却是不容等待的，只能以信念来确定之。我们知道，胡适在论证白话合法性时是从传统里找根据的，将白话的源头上溯到诗经时代，就是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之父”胡适看来，白话并不是现代的产物，而是传统中早已有之的，只是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罢了。

就国人对于传统的态度而言，总是与中华民族的强大与否关系重大。从大势上看，当国家民族贫弱之时，抨击传统、要求变革传统的呼声高涨；当国家民族强盛之时，则继承和学习传统的声浪鼎沸。

晚清民国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如何改变现状，使之从贫弱中崛起，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从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大国强国，成为几代中国知识精英的集体追求。在思想文化领域，晚清变局中最为强盛的思想潮流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843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19世纪60年代，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诸公发起洋务运动，提出“自强”“求富”口号。在“自强”思想指导下，兴办了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了其他企业，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技术，建立配备新式武器的陆海军。在“求富”思想指导下，以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构建起中国民族官僚企业的雏形。这场运动持续了三十多年，开启了学习西方技术的先河。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戊戌变法的流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大有式微之势。随后，激进的“全盘西化”之风越刮越强劲，知识精英对固有政治制度、伦理观念、文化传统的不信任感加剧。到“五四”前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涌起一波高潮，吴稚晖、吴虞、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

人、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从不同方面对传统文化发起了攻击。吴稚晖、钱玄同、鲁迅，是其中最为激愤者。吴稚晖要把国故扔到茅坑里去，鲁迅、钱玄同都主张废除汉字，鲁迅还对国粹京剧、中医嗤之以鼻，称梅兰芳氏的京剧为“梅毒”，谈及中医时也充满抵触和奚落。另一个大肆提倡西化的时代，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李泽厚、庞朴、王元化、包遵信、刘晓波、甘阳、金观涛等为代表。李泽厚提出著名的“西体中用”说，最为激进者为刘晓波，1988年香港《解放月报》主编金钟采访他，问他什么条件下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他的回答是“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①

上述时间段大致对应综合国力较弱时期，现实问题的复杂、胶着，前进道路的重重困难，往往都会归咎到传统文化上，并以反思和批判传统为契机，重新整合思路，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近年来，经过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一条适合国情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总体明晰。在此情境下，如何看待传统，如何评估传统文化，就有了更为平和的心态和宽广的视野，对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反思不再预设批判立场，人们从自身和身边体察到更多美好的民族传统中传承的东西。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有深入发展，对于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研讨就是成果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无视旧体诗词创作的现代文学史是不完整和不严肃的，如沈卫威、陈友康、曹辛华、王泽龙、李遇春等学者就一再强调旧体诗词在民国文学中的比重与地位。

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存在与延续一直很强劲，无论承认与否，这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庞朴说：“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在他们长期的生活过程中慢慢流传下来的一些风俗习惯和思维模式。”“对于传统，我们既

① 《刘晓波其人其事》，中国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10/26/c_12703288_3.htm，2010年10月26日。

4 民国时期新旧文学关系散论

不能割断,也不能肢解。唯一可能实现的方法,是让我们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慢慢地转化。”^①在激进反传统的时代氛围里,传统及其文化往往被污名化,成为现实苦难与困境的责任者,传统及其文化中优美和值得继承的东西也经常被忽视。只有当国家强大、民族自信心提升的历史时段,传统及其文化美好的一面才会被发现、被放大。近年来,随着大陆经济力量的高速发展,综合国力骤然提升,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被激发,90年代以来的“文化热”“国学热”无不是文化自信心提升的表现。在此氛围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开拓了对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 作为传统组成部分的旧体诗词

长期以来,传统中国有“诗歌王国”之称,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名篇佳作脍炙人口,历代诗人灿若星辰。自先秦,经秦汉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元明及清中叶,旧体诗词都备受推崇。唯有到了晚清,传统中国遭遇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的一切无不处在动摇和改造中,旧体诗词也是在这一历史特定时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批判,新文学也是在批判旧文学的斗争中披荆斩棘开辟新路的。

传统是在一定区域内由综合因素长期化合而成的,不是可以随意改变的,即便传统文化在物质形态上有消损,精神层面上也会留存久远。维特根斯坦说:“先前的文化将变成一堆废墟,最后变成一堆灰烬,但精神将在灰烬的上空萦绕盘旋。”^②如何处理与传统的关系,既是理论课题,更是现实问题,庞朴说:“过去我们对待文化传统有几种做法。一种叫做彻底与一切旧的文化传统决裂。五四运动采取的就是这个办法。”“第二种办法,叫做‘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一面吸收,一面批判。这个听起来是很好,但是也做不好。”紧接着,庞朴说:“对于传

① 庞朴:《文化的界说》,《新华文摘》2009年第19期。

② [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笔记》,许志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统，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既不能用割断的办法，也不能用肢解的办法。或许，只能有第三种办法，叫做慢慢地转化……让我们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慢慢地转化。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会很长，可能很痛苦，也需要更大的自觉”。^①

事实正是如此，所有用粗暴手段以为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又重新回到问题域，需要重新定位和阐释。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旧体诗词在民国文坛的地位和作用就是近年来一再被讨论的话题。众所周知，胡适、陈独秀揭橥的白话文学革命吹响了对文言传统文体进攻的号角，旧体文学一时间成为激烈论争对象。借助有偏向的传播，在意识形态话语参与塑造的情形下，今天留在普通读者心目中的“旧派”早已被污名化，不会外语却翻译了大量译著的林琴南，留着小辫、穿着长袍马褂、满嘴“茶壶茶杯”理论的辜鸿铭，鼓吹国粹却又离婚别娶的梅光迪们，成为耳熟能详的坊间谈资。大量非历史的、道听途说之说四处传播，把这段历史剪裁、增补、扭曲得面目全非。本来没有这么激烈的，被描述得血雨腥风；本来只是意见分歧，被夸张为不共戴天；本来只是文化事件，被描述、整合为政治事件；本来应有的学理性分辩，被人为嫁接了价值判断、主义之争。

旧体诗词作为旧文学的样式，在民国时期受到重大冲击，被贴上“死文学”的标签。通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上至少列举了新旧文学的三场斗争，即与林琴南的斗争，与学衡派的斗争，与甲寅派的斗争。这些文学史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林琴南、梅光迪、吴宓、章士钊等领军人物塑造为新文学甚至新文化的对立面，有意无意中将语言工具的论争上升到价值判断和主义之争上去。其实，虽然章士钊曾一度担任教育总长，试图借助权力挽文言于既倒，扶植旧派势力，但终因其地位不稳，政令不能发挥应有效力而显得孱弱。其实何止章士钊无力，章士钊所服务的北洋政府也因政争和军阀拥兵自重而自顾不暇，是典型的弱政府。

^① 庞朴：《文化的界说》，《解放日报》2009年8月2日第8版。

6 民国时期新旧文学关系散论

作为传统组成部分的旧体诗词，在民国时期出现身份和表现上的“暧昧”现象。先来说说身份上的暧昧现象。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刘半农、郭沫若等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提倡者，对旧体文学猛力攻击，称之为“死文学”，要将其送入博物馆，但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又在大量使用旧体文学，如他们都写了大量旧体诗词，写半文半白甚至全文言的信件，作的挽联无一例外用对仗平仄工整的传统旧体形式。旧体诗词等传统文学形式既被新文学家们诅咒、恶骂，同时又被他们不厌其烦、浑然不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应用，这就是笔者所言的身份“暧昧现象”。若细致考察新文学家们的日常交际使用的文字情况，对旧体文学形式的使用实在颇为惊人。接下来聊聊旧体诗词在表现上的“暧昧”。王国维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旧体诗词等传统文学形式进入民国时期，对照晚清以前的旧体文学，发生了种种新变。同样是旧体，但传达的内容却与传统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以严复为例，他翻译的西方经典政治理论著述《群己权界说》《天演论》等，用的是文言，但表达的观念是解构君主专制传统的，鼓吹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动摇了“君权神授”的根基。黄遵宪、梁启超们在晚清开始在旧体诗词里面嵌入大量新词汇，民国时期这种现象更是有增无减。凡有野心的旧体诗词作者都竭力表现旧体诗词融汇新词汇、新观念的能力，吴宓以旧体诗词形式翻译西方诗人的现代诗，他的朋友吴芳吉也将大量的新名词融入旧体形式中。在表达方面，民国时期旧体诗词风格总体上有从古奥文雅向浅白通俗的演变趋势，胡适作的一些旧体形式的诗词，可以说就是“白话文体+旧体形式”，像陈寅恪那样坚持作古奥文雅的旧体诗词的人其实是不多的。

“五四”新文学昂然踏入文坛主流，旧体文学日渐式微，在新兴媒体上所占比例越来越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值得一探究竟的是旧体文学是完全消隐在历史的忘川之中，还是幻化千身，融入新文学，如前人所言“千山有水千山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呢？这无疑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三 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研究现状

新时期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对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研究日渐形成规模,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研究院所。从踏入该领域学者的学科归属看,主要有两拨人,一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在资料阅读过程中有感于大量旧体文学存在的事实,开始质疑传统文学史对旧体诗词等视而不见的做法;另一拨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尤其是近代文学研究者,研究视角自然延伸到宣称白话文学革命的民国时期,他们发现大量民国时期旧体文学创作,从而将其笼括到古典文学的研究范围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掘出民国时期越来越多的旧体文学创作,也引发了许多值得继续追寻的问题,从而形成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下面就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研究现状分述如下:

首先就国内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旧文学的形式被人为地设定为新文学的对立面,被贴上了“落后”“腐朽”的标签,有意无意地处于受压抑、被忽略的地位。在新文学研究的观念上,长期存在一种一元化的直线史观,认为中国旧体文学发展到晚清,已是日落西山,理应走入历史,由新文学斩断前缘,另立传统,古典与现代,亦应于此截然划分。这样,民国时期旧体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就处于尘封状态,经历了一个长长的冬眠期。新时期以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过去研究中存在的偏颇。以专著形式比较全面描述民国时期古体诗词的是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这是拓荒性的著作,资料收集颇丰,这也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驰骋的空间。单篇论文方面,如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沈卫威《“学衡派”文化理念的坚守与转变》(《文艺研究》2015年第9期),曹辛华《晚清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的类型、特点及其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王泽龙《关于现代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李遇春、戴勇

《民国以降旧体诗词媒介传播与旧体诗词文体的命运》（《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等等。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探讨了不同问题。如陈廷湘的《政局动荡时期中国学人的生存样态——从李思纯〈金陵日记〉〈吴宓日记〉〈胡适日记〉中窥见》，暗示了很多有待进一步思考的话题，秦弓的《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掘与继承》列举了大量史实，证明了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血脉关系。就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研究而言，具体到地域方面，京、津、沪、苏、锡、常等地的研究较为充分，在其他地域民国时期的旧体诗词活动的研究方面还非常薄弱。

其次，就海外的研究状况来看，由于很少受到国内刚性意识形态的限制，海外学人在研究方法和思路方面有诸多创建。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研究，就有力打破了僵化的直线史观的研究模式，以“被压抑的现代性”检视了晚清文学被新文学传统过滤、窄化的过程。这对于民国时期旧体文学的研究有很大启发。海外学人的成果传入国内后，大大解放了国内研究者的思想，拓展了研究者的视界。不少学者开始注意到利用传统旧形式传达现代理想的命题，并着力揭示新旧之间的必然重叠的关系。

四 研究框架

拙著拟从晚清民国初期的启蒙思潮谈起，盖因文白之争萌蘖于启蒙思潮中启迪民智的原初理想，启蒙思潮的最初开启者并不是要全面用白话代替文言，而是在启蒙的功用层面提倡浅白易懂白话的文体。紧接着在新文化运动中揭幕的白话文学革命，实质上是要以白话全面代替文言，使之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主体，不仅是在启蒙底层意义上，也要在中上知识阶层全面用白话接管文言的存在空间，通过一个简短的“尝试”过程，来一个面貌全然一新的替换。就是说白话由原初部分的、功能性的设计，一变为整体的、结构性的实践。这个变化是相当巨大的，在其建构过程中伴生着种种问题，对于白话来说是一边破坏，一边建设。具体过程之复杂，绝不是文学革命倡导者所言的那样顺畅、简

单，即便到今天这一过程是否终止也是一个问题，可以说，文白之间的内在紧张与和解，一直持续着。

概略来说，拙著努力探寻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宏观方面的——旧体诗词在新文学中的地位。这就涉及诸多问题——比如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等等。一种文化传统是经过历史长时段的延续所形成的，并内化为文化潜意识，不是某个激烈的短时运动所能中断的。文学传统也不例外，思想情感的模式、审美观念的内容都源自传统文化的母体，而思想情感模式、审美内容的表达方式也有传统惯性在一直起作用。民国以来旧体诗词的繁盛，正是其表现之一。二是微观层面。以安徽为例，就近代以来的文学事件来看，具有某种典型性。晚清以来，安徽就是人文繁盛之地，以女诗人为例，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附编》中收入了近代诗人168人，安徽就有15人，占10.3%的比例，仅次于江浙两省，排名第三。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与两个安徽人陈独秀、胡适有绝大关系，他们是新文学的领袖人物。就文化/文学观念的激进来说，这两人无疑是代表人物，而在其日常书写中，却大量使用旧体文学形式。考察陈、胡等新文学中人的旧体诗词创作与新文学的关系，是一直被忽略和漠视的课题，而这一考察对认识新旧文化、新旧文学之间复杂而深刻关系无疑是有重大作用的。可以作为个案来加以研讨的安徽学人，还有皖北颍上县的常任侠，他对新旧文学都有涉足，与黄侃、吴梅等人关系密切，曾参加了不少旧体诗词的雅集与结社活动。1949年以来，是当代文学时段，这一时期旧体诗词依然有大量创作，尤其在新时期，各地旧体诗词的刊物和结社如雨后春笋，创作人员遍及社会各阶层，这种现象也还没有得到学理层面的重视和充分研究。

结语 关于文学史研究应有的观念及其他

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从全球范围看，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全球一体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凭借军事技术力量在全球范围内推进

的，这一进程使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华帝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其中，被动挨打、国破家亡，经历了种种落后国家的破败之痛，被迫开启了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趋势，如何使国家民族快速褪去窒碍灵便行动的老朽躯壳，则是其后种种社会思潮及其观念的内在动因。这一进程在近现代中国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貌，观念之间的冲撞，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垒，社会的分化及分裂，内在统一的需要与实际分裂的现实，外敌入侵与和平建设的矛盾，一再阻止着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使一代代中国精英分子在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偶然性之间挣扎、斗争，个人命运也表现出各不相同的面貌。

就现代文学研究来看，很多学者秉承一种断裂的观点看待现代文学史历程，将这段丰富复杂的历史简约化，抽绎出几条纲要性的条目，从而将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白话与古文、审美与功利等关系密切、互联互生的范畴对立起来，这就将历史虚拟化、本质化了。

关于文学史的现代建构确实是很值得细心思索的，传统的东西怎么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十年里转型了呢？1904年林传甲和黄人的文学史与后来胡适的文学史为什么变化如此之大呢？是墙倒众人推吗？这样一个转型，很明显的后果是方便了西学的传入，从分类的标准，从术语的通用性，从思想的共同性，等于是给西学修了一条便捷的信息通道。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一书里描述了中国20世纪初叶二三十年间的文学史写作状况，给我们很多启示。其实，传统是在强大的西方话语的压迫下一度转入低语状态，但并没有落荒而逃，而是在积极改换行头，重新出头，尤其是借助西方的话语，再度与主流话语争夺话语权。她指出：“必须抛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偏见，警惕种种后设的理论、原则、标准，对不入流的另类‘文学史’的存在及其影响，尤其要给予充分的重视。”^①

值得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以断裂的方式谈论历史。詹姆斯·辛普

①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森指出：“历史上的断裂既是必要的，又是欺骗性的。它们对于历史编纂学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历史学家需要分期。在西方世界，我们所有的标准历史分期都生成于历史动荡或者革命。因此，古典时代末期从异教信仰向基督教皈依的革命、1517年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1649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革命等等，其中每一场宗教的、军事的或政治的动荡，都被归入我们所理解的历史之中。”“断裂又是欺骗性的。断裂宣称历史又一次开始。它们宣称已经破坏了过去，已经接种了过去的病毒；它们宣称从零纪年开始。这种宣称，在我看来，往往是欺骗性的。深层的历史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再度浮出水面。历史学家不仅必须看到断裂，看到新事物，而且还得看到那些断裂时刻的宣言背后的东西，看到历史如何再度浮出水面。所以，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无从选择，只能接受被分割开来的历史；另一方面，真正的历史学家又需要看到革命时刻的宣言背后的东西。革命时刻会让我们相信历史可以被喊‘停’，会让我们忽略先前的、被断绝开来的历史；而真正的历史学家则需要把断裂时刻本身作为一个被过去所塑造的、以强有力的方式重复过去的历史现象来处理。”^①很久以来，我们秉承的文学史分期都是政治分期的方式，而政治是有强烈断裂感的，经常以斩断前缘的方式来开启新航向。文学史分期与政治意识形态上对社会历史的分期同构，暗示着文学史书写对政治权力的皈依（或者至少是政治对文学影响的巨大）。

近年来，学者不断要求“重写文学史”，在文学史分期方面，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文学史”概念，严家炎前几年编写的文学史，则将现代文学史推延到19世纪晚期，这些其实都内在包含了文学研究摆脱政治干扰的内在诉求。陈思和、王晓明倡导的“重写文学史”，也刺激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和讨论，其中就包含文学史分期问题。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内在线索的认知和探索方面。1988年，

^① 张颖：《把历史熔为一体——詹姆斯·辛普森教授访谈录》，《文艺研究》2015年第6期。